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L'obvie et l'obtus

显义与晦义

文艺批评文集之三

Essais critiques III

[法]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 著

怀宇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L'obvie et l'obtus
显义与晦义

文艺批评文集之三

Essais critiques III

[法]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 著

怀宇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显义与晦义：文艺批评文集之三/（法）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著；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
（罗兰·巴尔特文集）
ISBN 978-7-300-235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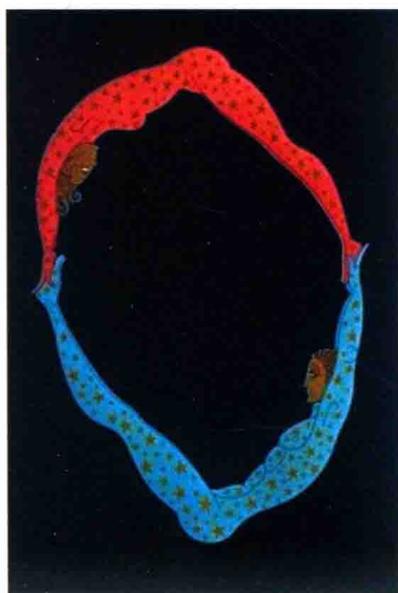
I. ①显… II. ①罗… ②怀… III. ①文艺评论—法国—现代—文集
IV. ①I565.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19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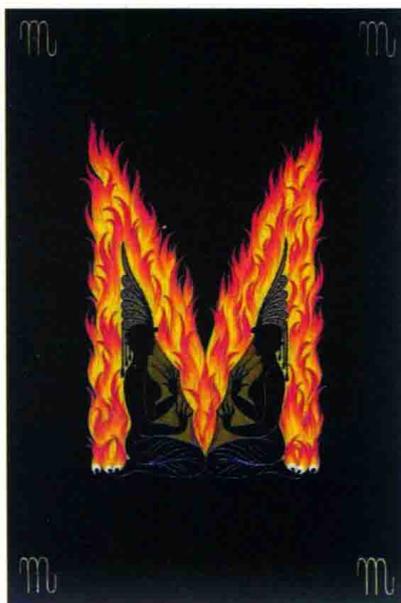
罗兰·巴尔特文集
显义与晦义
——文艺批评文集之三
[法] 罗兰·巴尔特 著
怀宇 译
Xianyiyu Hui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1.5 插页 4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2 000	定 价	4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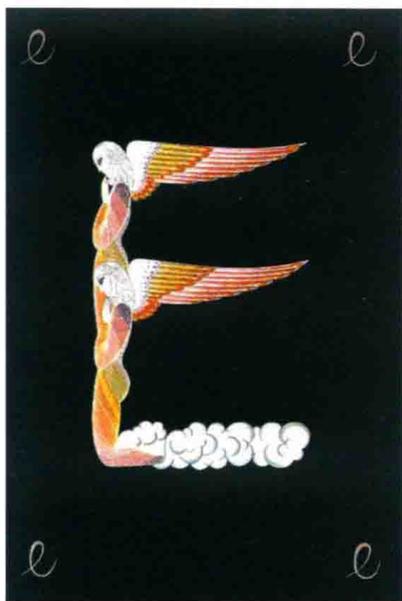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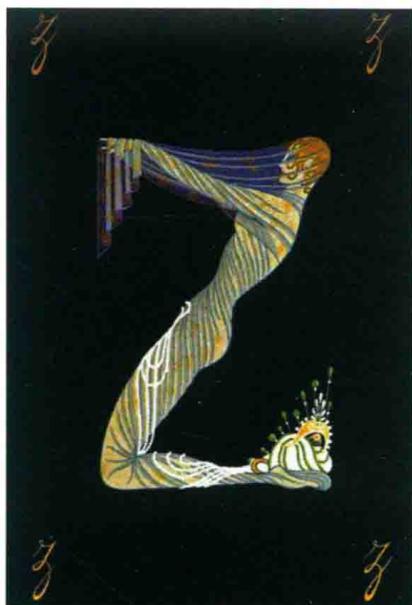
字母 O (埃尔泰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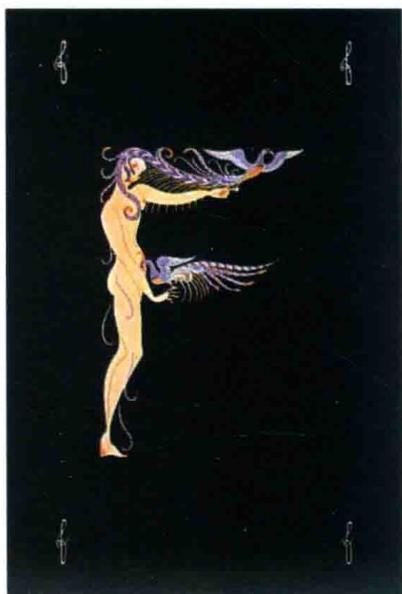
字母 M (埃尔泰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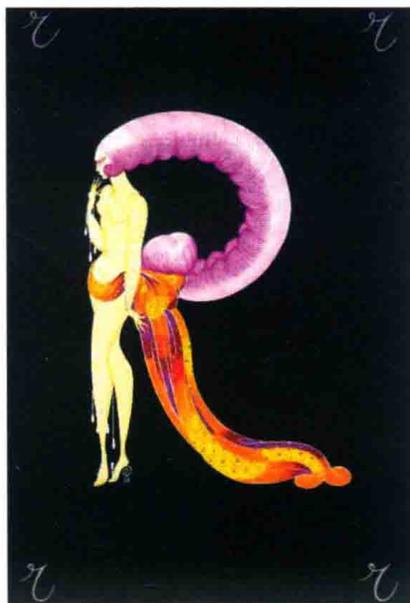
字母 E (埃尔泰绘)



字母 Z (埃尔泰绘)



字母 F (埃尔泰绘)



字母 R (埃尔泰绘)

总 序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是已故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思想家和理论家，结构主义运动主要代表者之一，并被学界公认为法国文学符号学和法国新批评的创始人。其一生经历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作者故世后留下了5卷本全集约6 000页和3卷本讲演录近千页。这7 000页的文稿，表现出了作者在文学、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学诸领域内的卓越艺术品鉴力和理论想象力，因此可当之无愧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家之一。时至今日，在西方人文学内最称活跃的文学理论及批评领域，巴尔特的学术影响力仍然是其他

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难以企及的。

1980年春，当代法国两位文学理论大师罗兰·巴尔特和保罗·萨特于三周之内相继谢世，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乃至西方两大文学思潮——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终结。4月中旬萨特出殡时，数万人随棺送行，场面壮观；而3月下旬巴尔特在居住地 Urt 小墓园下葬时，仅有百十位朋友学生送别（包括格雷马斯和福科）。两人都是福楼拜的热爱者和研究者，而彼此的文学实践方式非常不同，最后是萨特得以安息在巴黎著名的 Montparnasse 墓地内福楼拜墓穴附近。萨特是雅俗共赏的社会名流，巴尔特则仅能享誉学界。

1976年，巴尔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资历的背景（据说20世纪50年代末列维-斯特劳斯还曾否定过巴尔特参加研究生论文计划的资格），在福科推荐下，得以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1977年1月，挽臂随其步入就职讲演大厅的是他的母亲。8个月后，与其厮守一生的母亲故世，巴尔特顿失精神依持。在一次伤不致死的车祸后，1980年，时当盛年的巴尔特，竟“自愿”随母而去，留下了有关其死前真实心迹和其未了（小说）写作遗愿之谜。去世前两个月，他刚完成其最后一部讲演稿文本《小说的准备》，这也是他交付法兰西学院及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他的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则是他结束6年疗养院读书生活后，对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屈辱的法国文坛所做的第一次“个人文学立场宣言”。这份文学宣言书是直接针对他所景仰的萨特同时期发表的另一份文学宣言书《什么是文学？》的。结果，30年间，没有进入过作为法国智慧资历象征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巴尔特，却逐渐在文学学术思想界取代了萨特的影响力，后者不仅曾为“高师”哲学系高材生，并且日后

成为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如今，萨特的社会知名度仍然远远大于巴尔特，而后者的学术思想遗产的理论价值则明显超过了前者。不过应当说，两人各为 20 世纪文学思想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遗产。

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是 19 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妨说罗兰·巴尔特是 20 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请参阅附论《罗兰·巴尔特：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欧洲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内容和形成条件变迁甚巨，“文学思想”的意涵也各有不同。文学之“思想”不再专指作品的内容（其价值和意义须参照时代文化和社会整体的演变来确定），而需特别指“文学性话语”之“构成机制”（形式结构）。对于 20 世纪特别是战后的环境而言，“文学实践”的重心或主体已大幅度地转移到批评和理论方面，“文学思想”从而进一步相关于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想的环境、条件和目的等方面。后者遂与文学的“形式”（能指）研究靠近，而与作为文学实践“材料”（素材）的内容（“所指”）研究疏远。而在当代西方一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处于文学科学派和文学哲学派中间，并处于理论探索和作品分析中间的罗兰·巴尔特文学符号学，遂具有最能代表当代“文学思想”的资格。巴尔特的文学结构主义的影响和意义，也就因此既不限于战后的法国，也不限于文学理论界，而可扩展至以广义“文学”为标志的一般西方思想界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选的这套“罗兰·巴尔特文集”，目前包括 10 卷 12 部作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兰·巴尔特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由于版权问题，出版社目前尚不能将他的其他一

些重要作品一一收入。^① 关心巴尔特文学思想和理论的读者，当然可以参照国内其他巴尔特译著，以扩大对作者思想学术的更全面了解。此外，文集还精选了菲利普·罗歇（Philippe Roger）的著名巴尔特评传：《罗兰·巴尔特传》（1985），作为本文集的附卷。

现将文集目前所收卷目及中译者列示于下：

1. 写作的零度（1953）·新文学批评论文集（1972）·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1977）：李幼蒸

2. 米什莱（1954）：张祖建

3. 文艺批评文集（1964）：张智庭（怀宇）

4. 埃菲尔铁塔（1964）：李幼蒸

5. 符号学原理（1964）：李幼蒸

6. 符号学历险（1985）：李幼蒸

7. 罗兰·巴尔特自述（1976）：张智庭

8. 如何共同生活（讲演集1）（2002）：张智庭

9. 中性（讲演集2）（2002）：张祖建

10. 小说的准备（讲演集3）：李幼蒸

附卷：罗兰·巴尔特传：张祖建

讲演集是在法国巴尔特专家埃里克·马蒂（Eric Marty）主持下根据作者的手写稿和录音带，费时多年编辑而成的。这三部由讲演稿编成的著作与已经出版的5卷本全集中的内容和形式都有

^① 在“10卷12部作品”之后，已经获得版权的巴尔特作品有《萨德 傅立叶 罗犹拉》（1971）、《明室》（1979）、《中国行日记》（1974）、《哀痛日记》（1977—1979）、《偶遇琐记 索莱尔斯》、《恋人话语》（1974—1976）、《显义与晦义》（1982），并有附卷《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著）。——编者注

所不同，翻译的难度也相对大一些。由于法文符号学和文学批评用语抽象，不易安排法中术语的准确对译，各位译者的理解和处理也就不尽相同，所以这部文集的术语并不强求全部统一，生僻语词则附以原文和适当说明。本文集大致涉及罗兰·巴尔特著作内容中以下五个主要方面：文本理论、符号学理论、作品批评、文化批评、讲演集。关于各卷内容概要和背景介绍，请参见各卷译者序或译后记。

在组织翻译这套文集时，出版社和译者曾多方设法邀约适当人选共同参与译事，但最后能够投入文集翻译工作的目前仅为我们三人。张智庭先生（笔名怀宇）和张祖建先生都是法语专家。张智庭先生为国内最早从事巴尔特研究和翻译的学者之一，且已有不少相关译作出版。早在1988年初的“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上，张智庭先生对法国符号学的独到见解即已引起我的注意，其后他陆续出版了不少巴尔特译著。张祖建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文学系，后在美国获语言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法国和美国任教至今，并有多种理论性译著出版。我本人在法语修养上本来是最无资格处理文学性较强的翻译工作的，最后决定勉为其难，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固然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几篇巴尔特旧译纳入文集，但更为主要的动力则源自我本人多年来对作者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偏爱。大约30年前，当我从一本包含20篇结构主义文章的选集中挑选了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这一篇译出以来，他的思想即成为我研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主要“引线”之一。在比较熟悉哲学性理论话语之后，1977年下半年，我发现了将具体性和抽象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而结构主义之中，又以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最具有普遍的启示性意义。

这种认知当然也与我那时开始研习电影符号学的经验有关。我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同时将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和克里斯丁·麦茨、艾柯等人的电影符号学纳入我的研究视野的。1984年回国后，在进行预定的哲学本业著译计划的同时，我竟在学术出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迫不及待地自行编选翻译了那本国内（包括港、澳、台）最早出版的巴尔特文学理论文集，虽然我明知他的思想方式不仅不易为当时长期与世界思想脱节的国内文学理论界主流所了解，也并不易为海外主要熟悉英美文学批评的中国学人所了解。结果两年来在多家出版社连续碰壁，拖延再三之后，才于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要感谢当时刚设立的“世界与中国”丛书计划，该丛书还把我当时无法在电影界出版的一部电影符号学译文集收入）。这次在将几篇旧译纳入本文集时，也趁便对原先比较粗糙的译文进行了改进和订正。我之所以决定承担巴尔特最后之作《小说的准备》的译事工作，一方面是“从感情上”了结我和作者的一段（一厢情愿的）“文字缘”，即有意承担下来他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书的译事，另一方面也想“参与体验”一段作者在母亲去世后心情极度灰暗的最后日子里所完成的最后一次“美学历程”。我自己虽然是“不可救药的”理性主义者，但文学趣味始终是兼及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这两个方向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之后决定出版另一位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的文集，周蔚华总编、徐莉副总编、人文分社司马兰社长，表现了对新型人文理论的积极关注态度，令人欣慰。本文集策划编辑李颜女士在选题和编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判断和组织作用。责任编辑姜颖映女士、翟江虹女士、李学伟先生等在审校稿件方面尽心负责，对于译文差误亦多所更正。

对于出版社同仁这种热心支持学术出版的敬业精神，我和其他两位译者均表感佩。

最后，我在此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约请我担任一部结构主义文集总序的撰写人一事表示谢意。这不仅是对我的学术工作的信任，也为我提供了再一次深入研习罗兰·巴尔特思想和理论的机会。巴尔特文学思想与我们的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距离。为了向读者多提供一些背景参考，我特撰写了“附论”一文载于书后，聊备有兴趣的读者参阅。评论不妥之处，尚期不吝教正。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2007年3月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导 读

《显义与晦义》是罗兰·巴尔特(R. Barthes, 1915—1980)的第三部“文艺批评文集”。与他谈论文学方方面面的第一部、第二部和第四部文集不同的是,第三部文集是有关多种艺术——概括说来是关于图像和音乐——的文章集结。像另外三部一样,符号学思想也贯穿在这部书中,因此,也可以称其是作者对于艺术符号学方面的发声。不过,我们能明显地看出,他对于艺术对象的分析没有脱离他对于符号学的整体运用。由于本书没有对相关符号学理论和罗兰·巴爾特的符号学思想进行较为集中的论述,所以,本篇“导读”打算在这两方面做一点粗线条的介绍和梳理,以利于读者阅读。

—

法国现代符号学思想，主要源于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 1857—1913)的语言学理论和后续一些学者的贡献。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于言语活动的科学做了完全创新的论述，并首次指出了对于社会生活中的符号生命建立符号学的可能性。实际上，罗兰·巴尔特也正依据索绪尔的相关论述建立起了自己的符号学构想。

首先，对于言语活动的拆分。索绪尔在1916年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言语活动(langage)拆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即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索绪尔认为，“在任何时候，言语活动既包含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①。这个“已定的系统”便是语言，它“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②；而那“演变”的成分则是言语，“个人永远是它的主人”^③。“把语言与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④用现在的话说得明白一些，语言是社会的人都可使用但也都都要遵守的一套表达规则，而言语则是个人对于这一套规则的运用；在我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们所概括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但是，语言与言语是不能完全相脱离的，语言是言语的基础，而言语则是语言发展的依据和渠

①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②③④ 同上书，35页。

道。由于语言是表达观念的一种符号系统，而它又比任何其他系统更适宜于使人了解符号学的问题，因此，在设想建立一种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时，语言与言语的划分就是非常重要的：将社会生活中不同符号按照语言概念和言语概念来进行划分，无疑已经是一种内容丰富的符号学探索。这便是罗兰·巴尔特在分析服饰时（见《服饰系统》）多次为我们做出的范例。在这本《显义与晦义》中，语言与言语两个概念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并且始终保持着索绪尔给出的定义。因此，在对这两个概念有所了解的前提下，获得在书中各种情况下提及的这两个概念的正确理解，也就非常重要。

其次，关于符号性质。索绪尔认为，对于有声语言来说，符号是音响形象与概念的结合，“我们把概念与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①，也就是说，两者缺一就不能构成符号。音响形象就是符号的“能指”（signifiant）部分，概念就是“所指”（signifié）部分。如果从有声语言扩大到书写语言，那么，符号就是书写标志与概念的结合。索绪尔认为，符号具有任意性特征，就是说，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在最初结合时是任意的。但在结合之后，符号便具有了稳定性，也就是说，不能随意地改变这种结合。罗兰·巴尔特发展了这一论述，他总结，符号具有层递变化的特征，即一个能指与一个所指构成第一个符号，这第一个符号作为一个新的能指借助一定的修辞手段与另一个新的所指（概念）结合，构成第二个符号，而第二个符号所给出的意指就是内涵。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文学文本属

^①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于“二级符号”。可以说，关于二级符号的论述，是罗兰·巴尔特为符号学做出的重大贡献，他也将其用在了多个领域的分析之中。从理论上讲，这样的结合还可以继续下去（可参阅其《神话》一书，法文原版第193-247页“今日之神话”）。至此，我们明确地看到，罗兰·巴爾特的二级符号学理论，带有明显的“符号三角形”的特征，即以“能指”为第一项、以“所指”为第二项和以“意指”为第三项组成的三角形关系，但它不同于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指出的“表象”“对象”和“解释”之间的三角关系。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于语言符号的“意义”（“signification”，现在多被翻译成“意指”）早有论述，但他是将这一概念放在“能指”与“所指”之外作为一种联系来论述的，而且他没有引进符号的层级概念。纵观罗兰·巴爾特的符号学论述，笔者认为，在不同的领域发现不同层级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方式，特别是对于在二级符号基础上寻找意指即内涵，占去了他大部分研究工作。读者可以在这部《显义与晦义》一书中看到作者对于摄影、广告、书写、绘画、音乐等领域的二级符号的意指或内涵所做的细致和精彩的分析，而这种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不同艺术类型的特征。

索绪尔有关符号的“形式”与“实质”的论述，对于理解符号的本质也是非常重要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告诉我们：“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所以语言学是在这两类要素相结合的边缘地区进行工作的；这种结合产生的是形式（forme），而不是实质（substance）。”^①紧接着，他又

^①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58~1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